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TIANZHONGHE YANJIU

田中禾研究

徐洪军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田中禾研究

徐洪军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中禾研究/徐洪军编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7-5649-1906-1

I. ①田… II. ①徐… III. ①田中禾-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2006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甘慧君

责任校对 韩琳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室

电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19千字

定价 5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作家群资料整理”研究成果

本成果出版得到淮河文明研究中心资助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 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http://v. book. ifeng. com/book/ts/7332. 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1 编选说明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3 田中禾 从《沙恭达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

8 田中禾 个人——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公

10 田中禾 二十一世纪我在怎样生活？

13 田中禾 商业时代的文学

18 田中禾 因文学而幸福——《明天的太阳》代序

20 田中禾 何向阳 文学与人的素质

28 墨 白 田中禾 小说的精神世界——关于田中禾长篇新作《父亲和她们》的对话

33 苗梅玲 田中禾 在文本现场自由行走——田中禾访谈录

42 李 勇 田中禾 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田中禾访谈录

47 南 丁 浪漫的田中禾

54 刘学林 田中禾——探险的故事或在路上

研究论文选辑

61 吴秉杰 发现一片新大陆——田中禾近作片谈

68 陈继会 对文化失范的困惑和忧思——田中禾近作的意义

76 段崇轩 田中禾和他的“人性世界”

82 段崇轩 合金式文学——谈田中禾小说的艺术表现

87 王 敏 变革时代中国农村的深刻剖析——试论田中禾的小说创作

92 梅蕙兰 母亲：永恒的生命底色——田中禾创作论

101 张书恒 非先锋的先锋性——论田中禾九十年代的创作转型

107 陈继会 曹建玲 历史·人性与诗性眼光——田中禾的文学世界

117 刘永春 乡土情感与人生况味——论田中禾的民间书写

125 刘海燕 当幻想气息渗入写作者的血液

- 129 李 勇 思想者的苦恼和艺术家的逍遥——论田中禾的小说创作
- 135 周立民 大地上的禾苗
- 139 霍俊明 他是一个持续性的“少数者”——田中禾近作与“当代”写作的难度
- 142 李丹宇 面对现实的思考——漫评田中禾的《五月》
- 145 宋遂良 沉沦·困惑·悲愤——评田中禾近作三篇
- 150 张德祥 时代氛围与农家院里的悲欢——评田中禾的中篇小说《枸桃树》
- 154 张德祥 现实变革与理想人格——评田中禾的两部中篇
- 158 曹建玲 自由无羁 纯真自然——田中禾《落叶溪》的美学特征
- 162 杜田材 《匪首》:一片新的艺术天地
- 168 何向阳 感性历史的文化复述——《匪首》:一次放逐的体味
- 175 巫晓燕 民间神话的审美呈现——简评田中禾的长篇小说《匪首》
- 182 刘 军 负重隐忍与自我删节:《父亲和她们》中的两位母亲形象
- 191 刘思谦 “她们”中的“这一个”与“另一个”——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中“两个母亲”人物谈
- 205 黄 轶 身份:二十世纪的“中国结”
- 211 刘宏志 话语嬗变与革命叙事的转型——田中禾《父亲和她们》对传统革命叙事的突破
- 219 刘 军 十七岁:个人切片与历史还原——田中禾《十七岁》阅读札记
- 225 苗变丽 “青春之歌”的多重变奏曲——田中禾《十七岁》成长叙事研究
- 233 刘 军 取法乎下与随心见性——评田中禾散文

作品年表

- 239 田中禾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51 田中禾研究资料索引
- 258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从《沙恭达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

田中禾

鲁迅“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的话对我年轻时的阅读兴趣肯定有很大影响；年轻人都喜欢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言论，鲁迅这老夫子成为几代青年心中的偶像，就因为他的反叛精神。如今骂他也好，护他也好，谁能如他那样敢说这样偏激的话？敢这样对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么不恭敬？——其实他不过是强调中国青年一定要走出封建文化的套子，开放胸襟和视野，把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当作自己的营养。无论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优秀的世界思想文化成果对我们民族的强大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真正使我爱上外国文学，是一本印度古典神话诗。读《沙恭达罗》的时候，我刚十六岁，正是青春萌动、多愁善感的年纪，一夜读完，激动不已，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那优美的情愫、纯洁的爱情仍然使我深深感动。虽然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不少诗，也写了不少诗，甚至还为自己编了三四本诗集。可《沙恭达罗》使我明白了什么是诗，明白了什么是文学的魅力，我于是告别了曾经非常喜爱、曾经非常崇拜的马雅可夫斯基和郭小川，整个暑假都沉浸在印度文学里。《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新月集》、《飞鸟集》、《游思集》把一个耽于幻想的男孩带入一个比天堂更美好的世界。泰戈尔的诗很难读懂，但那里行间涌动的激情撼动我少年的心，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子变得如星空一样深邃辽远、绚丽多姿。生活是这样可爱，人生是这样美好，生命是这样美丽。我每天都想作诗，每天都想唱歌，每天都想读书。如果那时有摇滚，我肯定会跳上台去大声向人们喊：“世界呀——我爱你！人们呐——我爱你！”“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啊，留下你们的足迹，在我的集子里。”泰戈尔这句诗成为我多年来日记扉页的题记。在苦难岁月里，在流浪的日子里，打开日记读到它，心底就会有热流涌动，心田就充满湿润。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用诗歌为我打造了一艘诺亚方舟，使我在此后二十年的沉沦中不消沉、不气馁，保持着不息的热情。这是真善美的力量，人的激情与尊严的力量。迦梨陀娑和泰戈尔把我带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文学中来，使我在高中的三年里结识了雪莱、拜伦、惠特曼、歌德、席勒、海涅、密茨凯维奇……那年夏天我开始迷上莎士比亚。他的十四行诗让我一唱三叹，终生难忘。一口气读完《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威尼斯商人》，诗与历史、故事与人生在语言的力量里被溶化为甘醇的美酒。文学因而成

为人的性灵的光辉。

爱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则是一九六〇年之后的事。一九五九年,高中毕业前夕,我的处女作长诗《仙丹花》出版,我那痴爱文学的二哥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被发配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劳改的时候,什么也来不及收拾,他却在匆忙中把那些曾经引他误入歧途的一捆书寄给我。收到这些书的时候,我自己也正遭遇人生的第一次危机。心高气傲的我因为二哥的株连而未能升入理想的大学,头顶那片灿烂的天空一瞬间变得阴霾迷离。二哥的书成为那颗骄傲、孤独的心的最好的安慰。《普希金文集》、《普希金诗选》、一套淡绿封面的“普希金叙事诗”丛书、《波尔塔瓦》、《青铜骑士》、《茨冈》……在那样的年头,这些书实在太珍贵了。不惟市面上难以寻觅,书上还留着随处可见的红蓝铅笔圈点的笔迹,那是二哥留下的纪念,它使我清楚地想见他读这些书时的激动心情。“不!可怜的人世并不值得蔑视,虽然我们的生只是短暂的梦,虽然我们的死只是断弦一声。”莱蒙托夫以他明快的语言拨动我忧愤的心弦。第二年我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开始了自己对自己的放逐。在饥饿与恍惚中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俄罗斯文学的悲愤、苍凉与那时的环境和心情十分吻合。虽然真善美仍然是我心灵向往的天国,而人世的忧烦与苦难使我结束了童话时代,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为一个忧患意识深重的青年。由俄罗斯诗人进入外国小说,大约正如王国维所说,是主观诗人进入客观诗人的必然吧。

此后我开始了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也开始了对外国文学的系统阅读。郑州市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的编目索引卡片成为我自修大学的提纲,按照这些卡片的指引,我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研读,还做了读书卡片和笔记。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读书写作,有了《初恋》、《父与子》、《罗亭》,住在生产队的车棚里,生活依然温馨。屠格涅夫使我入迷,是因为他那贵族气质和充满怜爱之心的温情。接着是一本又一本的巴尔扎克,犀利的文笔、铺陈的描写、粗鲁冷峻的目光与屠格涅夫的高雅、纯粹和温和形成鲜明的对照。左拉、福楼拜使我明白了如何面对真实的人性,在情与欲中窥见人性深处的奥秘。老托尔斯泰以他巨匠般的气度使我懂得了巨与细、事与情、叙述与描写的关系。“文革”中找不到书读,有位朋友私藏了一本《复活》,它便成为我日日研磨的范本。前后封皮破损了,我不得不用牛皮纸把它重新糊好。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叩响玛丝洛娃房门的夜晚,玛丝洛娃雨夜私自到车站迎候情人的焦灼、绝望和悲伤,使我乡村生活的夜晚弥漫了细雨般的浪漫。从此我更加坚信,氛围、细节是文学的生命。

当我结束二十年的漂泊,重新开始写作时,比我年轻的一代人已经成为名家,我自己却还是一个怀抱文学梦的业余作者。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一本介绍西

方现代派文学的小册子,发现自以为靠外国文学营养走上文学道路的我,原来对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知之甚少。正当苦于找不到要读的书时,在我们文化馆那个小小的图书室里我居然发现了一本《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书真把我震撼了。卑琐的人物,荒唐的行为,混乱不堪、不可思议的人生故事,卑劣、贪婪、自私,人生的丑陋被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几十年建设起来的以真善美为追求的文学观一夜崩塌,正如有阳光就有阴影,有英雄主义就有非英雄主义,有理想主义就有非理想主义,《沙恭达罗》的真实是少男少女的真实,《第二十二条军规》却是成人世界的真实。《沙恭达罗》使我感动,《第二十二条军规》使我觉悟。如十六岁时的饥渴一样,《第二十二条军规》引起了我的第二次阅读饥渴。如果说那一次是求知的出征,这一次则是一个过久滞留于荒岛的流浪者对一个陌生世界的认识。从波德莱尔、艾略特开始,我又像从大学退学刚刚下乡时那样,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阅读。虽然二十年没有写作,写东西的愿望很强烈,我还是把时间划成三份,三分之一读书,三分之一跑社会,三分之一写作。从补课到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心情由紧迫而从容,外国文学的阅读再次成为人生的乐趣。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海明威、福克纳。不只是他们的才华、勇气、看取生活的目光给我以鼓舞,那流畅、结实、归真返璞的语言也特别使我感奋。诺贝尔奖授奖词里称赞福克纳的语言像一颗颗钉子,真是恰如其分。归根结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到了二十世纪,小说不仅是讲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讲。用一句简明的话说,小说是讲一个新鲜的、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二十世纪的小说是如何把有意思的故事讲得新鲜、有趣。《百年孤独》使我丧气,外婆和母亲对我说的那么多神神鬼鬼的故事一下子都不能用了。本来也许我会写出魔幻来,不幸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抢了先。我从不认为博尔赫斯有那么重要,尽管他被尊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先驱,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我承认他的智慧游戏能启迪人的心智,开发人的精神,但兜不出花园里那条交叉的小径,文学很难有大气象。正如我很赞赏卡尔维诺的智慧和创意,但我觉得也许他是缺乏构思的魄力和耐力,不得不干脆以破碎代替完整。卡夫卡是不可学的,尽管二十世纪中叶寓言小说盛极一时,但小说不可以都变成寓言。新小说派反映出现代审美更重视感官效果。《弗兰德公路》里纯描写的场景俨然是电影画面,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几乎是电影脚本,罗伯·格利耶干脆声称自己写的是电影小说。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眼里的中国当然更加敏感。这种双向交流能使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哪些东西是值得警惕或扬弃的。西方现代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手法上都从东方文化汲取了营养,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自己的文学感悟,在发掘精神境界,

张扬人的想象和虚拟上,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成熟得令他振奋的创作实践。至于庞德在中国诗里领悟了象征主义和印象派意境;布莱希特从梅兰芳那儿看到了戏剧的间离效果和抽象手法,找到了打破西方戏剧三一律的根据;卡夫卡的寓言有明显的中国志怪小说的影响。美国一位叫刘若愚的教授写了一本《中国文学理论》。他对中国文学的精髓是“玄学论”的论述非常精辟。他认为实用主义文学观从唐、宋以降日渐强大,逐渐成为文人的济世工具、统治者的精神武器。“文以载道”的“道”遂与魏晋“天人合一”的“道”大相径庭。但以宇宙、自然和人为主体的“玄学论”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灵魂。西方人对中国人乃至中国文学有一个潜意识的定位。赛珍珠也好,杜拉斯也罢,他们是以一个文明人看待愚昧民族的目光来看我们,同情、怜悯之心溢于言表。这很难责怪别人。如果说中国老百姓的奴才心理情有可原,那么我们那些自命为优秀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呢?去年,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华人作家用英语写了一本小说《Waiting》(等待)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故事、主题应该说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早已不再新鲜,而那书的封面却是一条纵贯页面的长辫子。这是美国眼中的中国人的最生动的写照。在西方人眼中,我们仍然是大清的遗民、“老佛爷”的奴才。长辫子虽然从脑后消失,但它根深蒂固地垂在中国人的心里。它使我想起近几年外出游历的观感。在巴黎,一个外国人开的中餐馆,为了证明它的正宗,一进楼厅,迎面供奉着康熙皇帝的画像。在悉尼,听说有个中华文化博览馆,费了很大劲找到它。进去一看,空空的房子里摆放着一条龙。而不远处最繁华的维多利亚大厦里,陈列着八国联军从北京掠夺的慈禧太后乘坐的玉车。一边是极尽豪华荣耀的维多利亚女王蜡像,一边是大英帝国的战利品——李莲英的蜡像躬身伺候着老佛爷玉石镶缀的车辇。最发人深思的是,陈水扁当选后,北美的华语电视台煞有介事地播放着记者到陈水扁家乡实地采访的报道。镜头对着陈家门口的水塘,说一百多年前有人预言这里要出真龙天子,清朝皇帝命人用一个大石沉在塘里,压着这里的风水。镜头转向塘边的大石,说这就是打捞出那块镇石,上边还有文字。看来,在号称民主选举的台湾,要说服民众,还须抬出真龙天子来。大约这就是中华龙文化?——以皇帝和奴才构成的图画,印证着带着文明眼镜的西方人的目光。而中国的电视、传媒和一窝蜂的莫名其妙的评论又在响应着这目光。有时,一些文化现象使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二十世纪末的知识分子的所为。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不面对民族与人类、继承与创新、精神与现实的矛盾。拉美文学的冲击激活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大约因为索因卡出自尼日利亚这个黑非洲不发达的国家,尽管他已经获了诺贝尔奖,却很少有人注意他。这位约鲁巴族黑人作家对乡土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和他对民族文化的审视与挖

掘,对我们中国作家应该有很好的启发。希姆博尔斯卡走过的道路值得思索,她是怎样从社会层面走入人性层面的?沃尔科特对民族文化与殖民主义文化的矛盾情感使我感同身受。“我曾诅咒大英政权的喝醉的军官,在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我该如何取舍?”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犬儒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的潮流,思想正被小品文化消解,精神遭遇着双重危机。如今读书,不只是写作的需要,更多是出于习惯。如果读书不能拯救自己,起码它能让你逃避。何况世界文学如运转的宇宙,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不同的精彩,那是人性的运动,生命的灵光。那里边不但能发现中国,也能发现自己。虽然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害怕我们会同心协力修出一座上天之梯,可他忽略了人类有诗,有文学,有艺术。那是人类这个生物种群的共同语言。中国作家以民族的、现代的、审美的精神来表现自己,沟通并不困难。

原载《世界文学》2001年第6期